

重

韩毓海 著


读


毛

泽

东

从 1893 到 1949

 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重读毛泽东

从 1893 到 1949

韩毓海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策 划: 孔 丹 黄书元 李学谦
责任编辑: 王 燕 孔 欢
责任校对: 方雅丽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毛泽东, 从 1893 到 1949 / 韩毓海 著 .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 - 7 - 5148 - 4400 - 9

I. ①重… II. ①韩…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 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4759 号

重读毛泽东, 从 1893 到 1949

CHONGDU MAOZEDONG CONG 1893 DAO 1949

韩毓海 著

人民大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75

字数: 379 千字 印数: 00,001 - 30,000 册

ISBN 978 - 7 - 5148 - 4400 - 9 定价: 7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瓦
高
河
東
跟
務
力
為
人
實
心
球
足

哲学是对宇宙的惊奇
政治的标准是区分敌我
经济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新的形式的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一盘散沙是无助的人民
人民是组织起来的铜墙铁壁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士大夫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宗派
阶级是躁动于社会母腹中的婴儿
新世界是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桅杆
江山是苍山如海
革命是朝阳如血

群众路线是到人民中去求良知
实践是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形成了路
运用矛盾是为了创造时势
一张白纸
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

前言

掌上千秋史

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重读毛泽东，从 1893 到 1949》，是计划中的《龙兴：1500 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第一卷，也是自 2010 年以来，我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千年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这一部分课程的题目原本是“大翻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起源”。

本课程所立足的，是对中华民族千年史的阅读与思考。

公元 907 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 53 年之后的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 1840 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自东汉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大姓郡望制度，随着唐朝的崩溃一同灭亡了，从中国制度的顶层设计来说，宋代以三司、二府，代替了唐代的“三省”制度，而实质上，则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士大夫阶级代替贵族阶级，成为国家的治理者。

从基层看，唐代的均田、府兵制度也随之瓦解了，而代替它的则是募役、募兵制度。秦、汉、唐以来“兵农合一”的基层组织，从此不复存在，统治基层的从此成为家族、乡绅和胥吏——乃至毛泽东后来所谓

的“土豪劣绅”。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然而，区别却是根本性的：那个时候的伦敦、巴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已经是武装起来的城市，因此，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武装起来的阶级，欧洲的社会结构就是以武装的城市对抗世界，而宋代的城市则是不设防的“清明上河图”，富饶的中国，不过是官商勾结的城市与一盘散沙的农村。

就是从那时起，中国逐步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土豪劣绅联合统治的治理体系，随着中国治理体系的衰败和治理能力的下降，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下降，直到1840年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击溃。

1913年，严复曾经一语中的地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这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极为透辟的结论。

因此，要了解传统中国何以衰落，现代中国何以兴起，就必须重视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

宋朝，是一个自觉地否定历史的王朝。

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就只剩下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宋朝的官吏队伍，在规模上远超历代。宋代的“官”是读书人，而

宋代的“吏”则是基层的豪强。官有名无实，吏有实而无名，这就是所谓的官吏二分制度。

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最终堕入一盘散沙——这些大宋“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

宋代的一统，乃是“小一统”，即它统一的不过是五代十国的那个区域，其周边始终有辽、金、西夏、蒙古环伺，故宋代士人的情绪是（内）忧（外）患，其开国基调则在“保守”二字，而其所保者，祖宗之家法规矩，其所守者，则为“小一统”之疆域。

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当然，宋代也并非全靠“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过活。“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宋于唐制，自然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即今天所谓的“要素市场”）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此类改革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于是便没有强有力的用人政策支持。而宋的“纲纪”，也就是“矫失为得”的“祖宗之法”，这种“祖宗之法”对于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的要求，并不是立德立功，而是听话、守规矩，于是，那个“纲纪”，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光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官员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

日本人说，“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的开端。不必说，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民族的敌人，成了我们的“客户”。“日驱驰千里，斩首三万而归”的汉唐气象，从此远去；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阿Q精神，则浮出了历史地表。

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勢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为什么有宋千年以降，中国的改革总是不能成功，而最终则逼出了

近代以来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大革命？为什么有宋千年以降，中国万马齐喑，而五四以来，中国却风云际会、英雄辈出，一举呈现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局面？

这里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宋代以来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几乎无人敢于立德，更无人敢于“立功”，甚至无人敢于说真话。所剩余者，无非就是沿着既成的规则，奴颜婢膝、吹牛拍马、想方设法往上爬——而这就是叶适所谓：“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寒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而随着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的腐败，中国这种扭曲的治理体系，造成的只能是治理能力的崩溃。

如果说到腐败，这才是真正的腐败。

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其实，无论是在世界历史还是在中国历史上，起先毛泽东都属弱势。他本是手无寸铁、身无分文的一介书生。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始终代表着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群众，他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以公平正义之“人道”，对抗弱肉强食之“天道”，他说：“人定胜天”，他的确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使弱者强大，使在历史中沉默无声的百姓堂堂正正站起来。

毛泽东是“拧沙为绳”的人。他以土地革命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缔造了工农子弟兵。他以武装农民的方式组织农民，改变了千年以降

中国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他使秦、汉、唐的基层组织形式以现代的方式重生，他以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最大胆的猜想：如果能以武装的农村包围武装的城市，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就将战胜“日耳曼生产方式”。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毫无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成为第一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选择的领袖，正如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而在他之前，中共的领袖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历史痼疾——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八股作风，并使中国共产党与这样的腐败作风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他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规矩。他缔造的党，摒弃了士大夫阶级的积习，以人民的要求，代替了“祖宗的规矩”；他使“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成为“圣地”；他以苦口婆心的整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治理能力，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他从作为“弱势群体”的人民中走来，他从不屈不挠的长征中走来，他从洗心革面的延安作风中走来，他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来，他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处——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

毛泽东是继往开来的伟大学者。

他是《读史方輿纪要》最细致的读者，他把清代以来融历史、地理、语言学为一体的朴素学风，发扬到了极致，并成功地将之运用于残酷的战争。他第一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所形成的平原阵地战，完全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毛泽东是现代运动战的鼻祖，他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闪电战和游击战。战争中的毛泽东，如此变幻无穷、那样神出鬼没，从而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奠定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革命的基础和基本战争原则。

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他使战士来自人民、信仰人民；他使战士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他是思想家、哲学家，但更是一个在行军中思考的游击队员；他是马克思，是列宁，但他也是拿破仑。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影响了广大的第三世界，而且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一切伟大的军事家。

“东风压倒西风”，他改变了人类斗争的形势，“到疆场彼此弯弓月”，他引发了人类军事史上的革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这是极为深切的见解。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当这门学科初创时，是威廉·配第把人口调查视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从而迈出了把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剥离出来的关键一步。工业革命以来，是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使社会学在建立公开透明的民主制度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正是毛泽东使社会学走出学院。他把人口、资源调查视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他把社会学的目标设定为组织社会运动、进行阶级分析；他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与下层劳动者血肉相连的学问。

毛泽东是中国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的主题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形成效益。而毛泽东第一个指出：西方经济学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并非资源的稀缺，而是资本的高度稀缺。资本近乎为零——这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联合宰制中国的结果，而资本高度稀缺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

对的根本瓶颈，是必须克服而此前的中国人却谁也没有能力克服的根本矛盾。

毛泽东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他领导建立了新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在资本高度稀缺的条件下，他推动建成了工业化中国。毛泽东缔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顶层结构——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制度，毛泽东建立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基层结构——工农联盟的工业化体系，而这二者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如果丧失了这两个根本基础，中国经济就根本不可能走出“宋代”。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奠基者。他把中国的“礼制”传统，与现代“法治”传统结合在一起，缔造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他发扬了《大同书》的理想，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深入地思考了内涵在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的“正义”与“权利”之间的深刻矛盾。正如他把战争理解为“流血的政治”一样，毛泽东把法律理解为妥协的政治，即把法律状态理解为政治的一种相对平衡形式。像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代西方法治体系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掩盖了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矛盾。如果照搬西方市民社会的法律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抑制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避免阶级斗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抓住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这一根本的哲学问题，他倡导实践对于认识的优先性，正如在他的早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身体”之于“灵魂”的优先性的观点。他是王阳明，也是斯宾诺莎；他是康德，也是马克思。拿破仑征战的时候，黑格尔在写《精神现象学》，而毛泽东却是一边打仗，一边吃着野菜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他强调自由对于必然的优先性，主张变化之于规律的优先性，倡导

改造世界之于解释世界的优先性，他告诫共产党人要“心中有数”，然而他又说：自由并不等于对必然的认识，正是时势与变数，方才决定了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正像马克思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一样，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他把中国古典哲学引向了现代。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不仅缔造了新中国，不仅创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也开创了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以及文化、医疗、教育体系，他力主把文化、教育、医疗的重心放到基层，培养了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新人、新青年。

毛泽东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中国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社会制度在生产与交往（社会再生产）进程中的运动规律，批判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明，把中国文明还原到社会制度发展的进程中，恢复并发扬了中国文化的政治和科学内涵。他在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进程中，缔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开辟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崭新境界。

毛泽东缔造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新中国的品格。这尤其表现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估与再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曾经把新道德概括为“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毛泽东则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进步勇于变革、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宇宙胸襟与世界视野、发展生产与尊

重劳动、推崇科学和崇尚平等，树立为新中国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他使古老的中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青春之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发达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正像一位外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湖南出了两个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使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人，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人。

法新社曾经这样评论说：“毛以一个小学教员创业，而到他去世时给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类创造了整套全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是第三世界政治的化身、穷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世界解放运动的灯塔。”

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毛泽东对日本的了解，令人感到他具有“东洋之心”，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就不胜寂寞与孤单。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则这样说：“毛泽东同罗斯福、丘吉尔和列宁一样是本世纪的巨人之一。他也许是这四个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他的影响持续的时间将更长。50多年前，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他后来领导造反、取得政权，于是成为中国的列宁。他的才干在空间和时间上一样影响深广。他是一个天才的基层组织家，在全中国点起革命的火焰；他是一位创造性的哲学家，给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讲道德的、东方的形式；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家，他曾经说他胃口从来没有像在打仗时那么好；他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以古典的形式写诗词，他自己的一生就是波澜壮阔的史诗。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成为世界力量三角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又是要求重新分配世界力量的穷人十字军的先锋。他扭转了500年来‘西方压倒东风’的世界结构。”